

曹雪芹在北京住过哪些地方

赵腊平

芹也得授从六品州同的官职。曹氏一家眼看兴旺在即，可是晴天霹雳，另一桩大案使得这一家人再次惨遭抄没，曹雪芹的祖母也终于在连番打击后撒手人寰。

屡逢剧变的曹家再次落魄，从此东山难起。曹雪芹也不得不离开了蒜市口，迁居到小石虎胡同33号右翼宗学居住。几年之后，不知什么缘故，36岁的曹雪芹辞去宗学教职开始了流浪生涯。37—42岁时，曹雪芹定居西郊原正白旗村39号（今北京植物园内曹雪芹纪念馆），直至1764年除夕之夜一代文圣悄然西去。

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

曹頔在给康熙的《覆奏家产折》中说：“所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那么这里提到的房产在哪里呢？

在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南沿上，有一个窄窄的巷口，从那里进去，就是大小翔凤胡同。有人考证说，《红楼梦》里的宁、荣两个府的原型就是大小翔凤周围的恭王府和罗王府。大翔凤胡同由于紧邻着过去的恭王府，是依靠王府围墙而形成的胡同，所以旧称为大墙缝胡同，后来雅化为大翔凤胡同。有红学家撰文说，“京中住房二所”其中一处就是今天恭王府的所在地。因恭王府的前身是和绅的府邸，而在和绅之前这里曾是一个小宅，故认为这是曹家内城的住房之一。

“京中住房二所”的另一处则是恭王府北边的大翔凤胡同北口6号的一个宅院。据周汝昌考证，大翔凤胡同北口外，后海南沿曾有一口古井，是旧时卖水的据点，故称“水窝子”，或叫“水屋子”，曹雪芹当年曾在此居住过。此事未见于古籍，却得见于人证。有一位老人名王文志，原系辅仁大学的工友，80岁时曾与周汝昌偶会于曹雪芹故居，老人说：他幼时听师傅讲，曹雪芹曾在恭王府（原范围很大）北边的三间小房住过，那是仆人们每日早起聚集听分配差使的地方；而这三间房后来被辅仁大学的一个管事拆了。

鲜鱼口现今尚在，位于前门大街东侧，与著名的商业街大

栅栏隔街相望。它形成于明代，叫“鲜鱼巷”，因附近商贩从前门外护城的“泄水河（后称三里河）”内打鱼，再拿到巷子里叫卖而得名。清代中后期，三里河的河水干涸，鲜鱼口发展成店铺相接的商业街。但由于“鲜鱼口空房”没有具体门牌或所属巷子，加之历经年代久远，街巷房屋变迁，面目全非，至今很难找寻。

崇文门外蒜市口大街16号

据雍正七年（1729）的一份《刑部移会》，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予曹寅之妻孀妇度命。”后经专家多方查证，并以清代《乾隆京城全图》佐证，蒜市口地区仅有一处院落是十七间半房，从而证实蒜市口路上的广渠门大街207号院就是文献所载之房产。后在1999年广安大街扩路前，对故居进行的考古研究也确认了其地基基础为“十七间半”，与乾隆京城全图的标注相符。所以，毫无疑问，蒜市口的“十七间半”房屋就是曹家在北京最早的住地，也是曹雪芹的主要故居之一。

具体地说，曹雪芹的这个故居的位置应该在现磁器口十字街的东北角和普仁医院之间。老一辈人回忆，到曹家院子先要走进一个小门，进门后向北通过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尽头西侧还有一个小门，门内为四合院，为清代或更早一些的民居。这座四合院原为蒜市口大街16号，院内有北房、南房、西房各三间，东房两间，院落较为宽阔。院内的老房均为青砖灰瓦、木格门窗，砖雕、石雕十分精细。有专家说，过去这个院落有屏，上刻“端正方直”，很可能为曹家祖训。里院的北屋还挂有“温玉环珠”的匾额。1965年，蒜市口大街和桅杆街大街、大石桥大街合并为广渠门内大街，这座四合院改为广渠门内大街207号。现在，原蒜市口的旧址、现普仁医院南面已拆成了空地，但其遗址仍依稀可辨。1999年扩建两广大街时，曹公故居是否保留曾引起了社会的关注。2022年7月29日，北京市崇文门外广渠门内大街上的蒜市口一座清代四合院落成，这就是著名的曹雪芹故居。



曹雪芹故居纪念馆

因曹家在蒜市口居住时的实物资料很少，对于曹雪芹到北京后是如何读书学习，又是如何考取功名的尚无考证。但有红学家撰文推测：曹雪芹曾在官办的“景山官学”或“咸安宫官学”学习，后考为“贡生”中的二品“拔贡”。有了这个“任职资格”，曹雪芹后来来到右翼宗学担任助教一职也就顺理成章了。

老北京有一句老话，叫“东城富、西城贵、北城穷、南城贱”。东城富的说法和京杭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当时的数据显示，清朝一共有13个大仓库，其中就有7个在靠近码头的东城。崇文门外一带充盈着中下层社会的生活氛围，既是故衣百货、农副产品的集散之地，也是商贩农夫、游民乞丐、市井豪侠乃至僧尼道士、三教九流的杂聚之区。

曹雪芹作为废官的家属，家败回京后即生活成长在这样一个地域的环境里，其实际交往接触和耳闻目见的，自然多有下层社会、各色人物的生活情景，这也使他对社会的体验和对人生的认识较之在江南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其成长、思想和创作产生既大且深的影响。《红楼梦》中他对刘姥姥等社会底层人物的描绘可谓惟妙惟肖、入木三分，应该与他在这一带的生活特别是与城市社会底层的接触是分不开的。（上）

莲池书院联匾赏析

张颖

莲池书院坐落于素有“城市蓬莱”之称的河北保定莲池池园内，为清雍正十一年（1733）直隶总督李卫奉诏而建，并以莲池冠名书院。莲池因书院而著名，书院因莲池园林秀美，聚引学子，弘扬教化而声播四方。书院是清代直隶最高学府，是传播传统文化、培育文品双馨的封建士人的官学化教育机构，深受清廷重视，乾隆皇帝四次莅临书院，赐匾题诗勉勵师生。

莲池书院名师辈出。这里有首任院长张麟甲（1670—？），乾隆时期院长章学诚（1738—1801），光绪年间国学大师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任院长时，书院有了极大发展。黄彭年任内，增置讲舍、购置图书、开设古学，书院进入鼎盛时期。光绪九年（1883），张裕钊任院长，改革教学体制，创新教育理念，进一步发展古学，缔造了直隶“桐城古文学派”，招收日本留学生宫岛大八，开展中外学术交流，声振东瀛。光绪十五年（1889），吴汝纶继任，他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东、西文学堂，开清代学院兼习西学之先例，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莲池书院培养的学生人才辈出，著名的有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湖广总督毕沅，直隶军阀首领冯国璋，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清光绪三十年（1904）状元、书法家刘春霖等。

莲池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停办，历经170年历史。遗址改称“校士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校士馆亦停办。光绪三十二年（1906），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故址建立一座直隶文学馆，直隶文学馆于1910年停办。1912年，在莲池书院旧址新建省立第二师范学堂附属小学。

而今，莲池书院的主体建筑为“君子长生馆”，也是馆内举办展览的主要场所。君子长生馆，面阔五间，进深二间，背西面东，歇山顶，前有卷棚廊厦三间，四周廊庑环绕，门额有“君子长生馆”五字匾，寓“君子之德，与世长存”之意。行宫时期（1745年），为了满足皇帝西巡驻跸的需要，直隶总督那苏图将古莲池池内的保定使馆改建为行宫，称莲池行宫，这里是“课荣书舫”。舫，泛指船，用于此处指建筑物凌驾水上，如舟行水，又为读书之处，故名“书舫”。西晋文学家潘岳写的《芙蓉赋》中云“课荣荣而此观，焕卓萃而独殊”，意即品评众花，只有荷花光彩焕发，超然出众。清同治年间（1862—1875），黄彭年曾带领他的学生在这里编纂《畿辅通志》。当时，肃宁县令送来一幅墨迹拓片，上有“君子长生”四字，众编修见此触景生情，于是把“课荣书舫”改为“君子长生馆”，其意是将池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比为君子，来借喻人居此馆，会修行长生。

君子长生馆中有两副对联珠为引人注目。

馆内柱联：
堂开绿野，园辟华林，俯仰千秋，留胜迹；
地接琅琊，山邻宛委，师承百世，启人文。



君子长生馆



君子长生馆联匾

此联为阳春李景明作于清光绪四年（1878），联中有四处用典故。绿野，指唐代宰相裴度有私人别墅“绿野堂”。华林，东汉、三国有华林园，为官苑。莲池为元代张柔开凿，后为张柔副将乔维志的私人园邸。清代曾做皇帝行宫，用“留胜迹”形容非常准确。下联琅琊，指“琅琊福地”，是见元代伊世珍所写《瑯嬛记》中的神仙洞府。宛委，指宛委山，会稽山的一峰，《吴越春秋》说禹登宛委山得金简玉字之书。整幅对联意为“古莲池曾是侯府园林，又辟为皇家宫苑，漫长的历史转瞬即逝，却留下了一处著名的古迹；它与琅琊福地接壤，同宛委山比邻，与文明的发祥地联系紧密，如今正承续百代之遗绪，振兴礼乐教化的大业。”此联作于莲池书院第一次扩建的时候，联语表达了继承前人、光大事业的恢宏志向。

馆外柱联：
花落庭闲，爱光景随时，且作清游胜地；
莲香池静，问弦歌何处，更教思古发幽情。

此联为如皋朱煥彰所作书联。当时，园林因多年军阀混战遭毁坏，莲池残骸狼藉，不可言状。1931年，时任河北省长的王树常集贤修缮莲池，9月完工，对联是修缮后写上去的。上联写庭花凋落，园景空阔，只能寻访往日的名胜地了。下联写莲池依旧，但“弦歌何处”？点明莲池书院不复存在，更教人发思古之幽情。其意为“岸上的花儿开始凋谢，游人稀少，庭院空旷冷落。园林里任何时候都景色宜人，是适合清雅游赏、寻觅胜迹的好去处。池中的荷花依然幽香，没有游船，水面平静如波。借问当年热闹的弦歌去哪去了？它的消失更激起人们怀古的深远情思。”此联情调低沉落寞，透露出作者对莲池往日繁盛景象的思念和对时事危难的忧虑。恰与上一副对联的踌躇满志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着莲池书院的兴衰变迁。

(上接3月28日6版)

保护国粹 赓续文脉

抗战时期陈训慈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播迁始末

侯培和

浙江省教育厅不肯出运费和受交通工具的限制，陈训慈深知这样步步迁移，实在是不经济的。较于省政府行政人员，教育界对于保存珍稀文献更为重视。随校内迁江西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时刻挂念文澜阁《四库全书》（下文以“库书”代指）的安全问题，1月22日便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

文澜阁《四库全书》硕果仅存，虽由浙大帮同运严州，似更迁内地为是云云。

随后教育部积极采纳了竺可桢的建议，拟将库书迁往贵阳，由浙大协同运迁。同时致电浙江省政府：

据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四库全书》已由该校帮同运严州，偏近战区，未妥。兹为保全国家文献起见，望贵省设法运黔。然而，对于教育部的指示，政府则不以为然，并谓：

此电甚空洞，主席（注：黄绍竑）见之甚不高兴，谓土地人民如放弃，文物何足云。入贵州岂谓黔省以西之大地悉准备放弃乎？教部有办法，惟自来运。

并电告教育部：
正迁湖南，不便迁远。

2月6日，陈训慈接到浙大由江西发来的电报：
教部已三电浙省府速将《四库全书》运往安全地点，并指令浙大协同办理，即派李掣非兄来浙，请兄赴藏书地方会商。

教部三电主运黔事，“则仍黄主席于此甚不谓然，近闻部电谓已令浙大派员来浙，省府绝不负责再迁，且车辆亦无可拨。余知车辆集中，实非无法，待部自来负责主运”。

对于此举，陈训慈不得不感慨：
黄氏（注：黄绍竑）为桂省名军人，曾主浙政，而竟浅度厄至此。人民能行，而书不能行，文物内保固非暗示尽迁他地拖累由。

教育部对于库书内迁问题的重视，陈训慈颇为意外；立此电竟如此重视《四库》欤？抑天津、文澜确知有被劫之虞欤？

1938年2月16日日记云：
此次教部之特别重视文澜本，盖鉴于盩山及江南公家藏书之覆车，要亦以《四库》存本日稀之故也。

客观言之，政府军政人员也有自身的难处。由于国难当头，局势紧急，保家卫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身份与职业的不同，政府人员与知识界文化人对于抗战保家卫国的关注点不同。政府人员更多地倾向于关注国土的安全、人民的转移及财产的保存。据时

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回忆：

我在杭州重要的工作，就是疏散。机关办去了，还有数十万的老百姓和重要物资，亟待运出境。浙赣铁路，及公路、帆船、一起动员，无不尽力的装载。……但是想将偌大的一个杭州城所有的物资和人民全部搬走，真是不可能的事！……然而交通工具太缺乏了，时间又是那样的紧迫，好多笨重的物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

而知识界文化人更深知文化是一个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珍贵典籍的留存对于民族抗战与民族复兴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库书的转移与保存更容易得到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

得不到浙江省政府的支持，教育部只得授命由浙江大学协助浙江省图书馆将库书内迁贵州。库书的转运过程中，在交通运输、地点寻觅、经费保证等方面，教育部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月下旬，库书由教育部代表李掣非、浙江省立图书馆总务主任史美诚负责护送，由浙江龙泉起运，经闽省浦城至江山通公路，由江山入赣至湘省长沙通火车，由长沙经湘北、湘西入黔直达贵阳通公路，图书入黔。4月30日，库书抵达贵州贵阳，存于贵州省立图书馆内。

1946年5月7日，库书由六辆汽车载运离开青木关，取道川南入黔，经湘赣入浙，历时近两月于7月5日入抵杭州，重归西湖孤山藏书库。九年间，辗转浙、闽、赣、湘、黔、川六省，民族瑰宝得以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最终安然返杭。

无疑，在库书的转移及保存过程中，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库书管理员毛春翔言，“此次倭寇入侵，烧杀焚掠，远胜于洪杨，图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还甚于往昔，八载身羁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于？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只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图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持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

在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及保存过程中，陈训慈等一批知识人将个人、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民族危亡之际、文化危亡之际均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所表现出的时代责任担当。正如其在日记中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力物力，蕴蓄何量，导而扬之，以制敌复国，大人之责，小民亦的自外耶？（下）

天禹 TIANYU
博物馆展览陈列

华夏文明
中国历史
展览

策展与设计 · 施工与布展 · 维护与保障

总机：
010 6403-3939

总 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大街107号 科林大厦 B座 5层
邮 编：100007

业务合作：13811280043
13811815934

维保服务：010-64043939
13811259340

邮 箱：tianyuan@tywhjt.com.cn
网 址：www.tywhjt.com.cn

关注天禹公众号

